

文艺美学研究丛书（第二辑）

当代审美教育与 审美文化研究

曾繁仁 谭好哲 主编



文艺美学研究丛书（第二辑）

当代审美教育与 审美文化研究

曾繁仁 谭好哲 主编

美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房宪鹏

封面设计:徐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审美教育与审美文化研究/曾繁仁,谭好哲主编.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6.6

(文艺美学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01 - 016054 - 2

I . ①当… II . ①曾…②谭… III. ①审美教育-研究②审美文化-研究

IV. ①G40-014②B83-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65409 号

当代审美教育与审美文化研究

DANDAI SHENMEI JIAOYU YU SHENMEI WENHUA YANJIU

曾繁仁 谭好哲 主编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墨阁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3

字数:365 千字

ISBN 978 - 7 - 01 - 016054 - 2 定价:60.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序

《文艺美学研究丛书》第二辑就要出版了，我感到特别高兴。第一辑主要是中心几位年龄稍长的老师们的成果，而第二辑则是我们中心 15 年科研工作的集成，包括了中心老、中、青几代学人、中心学术委员会成员以及中心培养的博士和博士后的部分成果。

在本文集出版之际，我想谈几点感想。其一是关于科研工作的特色问题。很显然，科研工作首先要坚持基本问题研究，在此前提下要尽量形成自己的特色，因为没有特色就等于没有新意，没有特色就不会有任何影响。即使是某一个热点问题，许多同人在进行这种研究，你的研究就需要有所推进，推进就是特色，开拓相对新的方向更是一种特色。15 年来，本中心在形成自己的科研特色上做了一些努力，在坚持文艺美学基本问题研究的前提下在审美文化、生态美学、审美教育、语言学文论、媒介文论等领域取得不少成果，也获得了学术界不同程度的认可和肯定。其二是研究队伍的年轻化。历史在前进，学术在发展，一代又一代学人前后衔接，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回想短短的 30 年，学术的发展真是呈现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态势。因此，学术发展的希望在年轻一代，目前主要在于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出生的学者。本文集收集了 15 年来本中心科研人员特别是年轻学者的成果，呈现了年轻学者的发展实力和学术风貌，这是非常可喜的事情。其三是教学与科研的结合。我们中心毕竟还是教学单位，立德树人是我们的基本任务，科研与教学的统一是我们的方向。因此，我们也收录了中心所培养的博士后在站期间和博士在读期间发表的部分成果，体现了中心人才培养的水平和新生代学人的学术实力。其四是学术界的支撑。学术研究从来都是一种公共的事业，我们中心作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得到了教育部和学校

特别是得到学术界同行专家尤其是老一辈专家的关心和支持。许多老一辈专家出任本中心的学术委员会和专家委员会成员，为中心的科研工作、学术会议、管理工作等方面都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本文集收录了担任过本中心学术职务的学者特别是老一辈学者的成果，反映了中心 15 年学术工作的现实，也表达了我们对于所有参与过中心工作的学者的敬意。

15 年弹指一挥间，抚今追昔，感慨万千，借此机会，我衷心地感谢文集中所有的作者对于中心所作出的贡献以及对我本人的支持、关怀和爱护。

曾繁仁

2016 年 4 月 10 日

目 录

序	曾繁仁 (1)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美育的发展走向与对策	王汶成 (1)
20世纪初叶美育新潮的兴起及其当代意义	谭好哲 (10)
“文明”与“文化”	陈 炎 (23)
西方现代“美育转向”与21世纪中国美育发展	曾繁仁 (33)
审美教育：一个关系到未来人类素质和生存质量的重大课题	曾繁仁 (37)
生活美学：21世纪的新美学形态	仪平策 (40)
辩证和谐美学与审丑教育	周来祥 (53)
论易儒道交融的中国古代和谐美思想	马龙潜 (59)
中华和谐美第一图	周来祥 (72)
——太极图的审美观照和理性思考	
“先王乐教”与中国早期美育的发展	祁海文 (82)
论中国美育研究的当代问题	杜 卫 (88)
论席勒美育理论的划时代意义	曾繁仁 (100)
——纪念席勒逝世二百周年	
中国与西方服饰的古代、现代、后现代特征	陈炎 李梅 (112)
从精英美育到大众美育：两种美育范式的并存与共生	王汶成 (131)
中国现代美育的历史进程与目标取向	谭好哲 (141)
往来不穷，道通为一	马龙潜 高迎刚 (163)
——中国当代艺术教育观念的形成和发展	
艺术教育与审美经验的培养	凌晨光 (170)

论“阴阳两仪”思想范式的美学意涵.....	仪平策 (179)
文学边缘化之后的大众文学教育.....	王汶成 (188)
中西现代艺术教育观念视野中的艺术的本质与功能.....	凌晨光 (194)
后启蒙与文化批判理论的危机.....	尤战生 (199)
——兼论批评合法性的重建	
现代中西艺术教育比较研究的启示.....	曾繁仁 (214)
文化的谱系.....	陈 炎 (229)
走出“文化研究”的困境.....	盛 宁 (239)
全球化时代文化多样性的意义.....	王 杰 (253)
关于歌谣的政治美学.....	曹成竹 (268)
——文化领导权视域下的“红色歌谣”	
拯救人性：审美教育的当代意义.....	王元骧 (277)
传播技术的进步与艺术生产的变迁.....	王汶成 (290)
当代传媒技术条件下的艺术生产.....	谭好哲 (299)
——反思法兰克福学派两种不同理论取向	
论审美教育对人类想象能力的开发.....	陈 炎 (314)
敦煌艺术中“天”的形象到“天人”形象的历史嬗变.....	曾繁仁 (322)
《吕氏春秋》的乐论问题.....	祁海文 (332)
由“乐”到“戏”：中国综合艺术的发展轨迹.....	陈 炎 (346)
编后记.....	谭好哲 (363)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美育的发展走向与对策

王汶成

伴随新世纪的曙光，人类迎来知识经济的新时代。在知识经济时代，以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全面发展的、新型人才为目标的素质教育，作为知识产业的基础，将被置于突出的地位，而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审美教育也将获得新的发展机遇。最近，国家领导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强调了美育的重要作用，预示着我国美育发展又一个高峰期的到来。在这样的时刻，重新提出和探讨美育问题，应该说是一件很有必要、很迫切的事。本文旨在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切入问题，着重讨论和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美育的现状和走向，并结合时代发展的需要，试图提出对策。

一、历史回顾^①

中国美育可谓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代，孔子就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认为人格的培养，起点和终点都要靠美育，对过程贯之以礼。庄子则提出通过所谓“心斋”（《庄子·人世间》）、“坐忘”（《庄子·大宗师》），而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的审美境界。孔子的美育旨在社会教化的“成人”，庄子的美育旨在个人修养的“达道”，从而奠定了其后2000余年儒家的伦理主义和道家的自然主义的古典美育传统。

^① 参见单世联《中国美育史导论》，广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413—560页。

近代以来，以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鲁迅、蔡元培为代表的一批最早接受西方文化的先进知识分子，从变革社会、改造国民性、挽救民族危亡出发，提出了新的美育思想，进行了新的美育实践，为推动中国美育由古代向近代的转换作出重大贡献。特别是蔡元培先生，作为民国政府的第一任教育总长，直接把他的“以美育代宗教”“以美育促文化”的思想落实到美育实践中去，与近代中国的改革进程和新文化运动紧密结合起来，产生了更广泛、更深刻的社会影响。

从 40 年代开始，随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取得新进展，中国历史进入新的转折时期，中国美育的发展也呈现出新的面貌。毛泽东在 1942 年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奠定了此后几十年党的文艺方针和美育方针的基础。毛泽东直接把文艺和美育纳入当时的政治斗争和革命实践，确定了解放区文艺和美育的首要任务就是配合现实形势、宣传党的现行政策，这对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投身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确实起了特殊的作用。

以 1949 年新中国的建立为标志，中国美育开始了当代进程。与当时新生的国家一样，新中国初期的美育呈现出蓬勃向上的势头。在学校教育中，德、智、体、美“四育”并提，并对幼儿园、中小学的美育课程作出明确规定。《谁是最可爱的人》《青春之歌》等一批优秀文艺作品，极大地影响了一代青年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审美观，产生了空前的美育效应。但是从 50 年代后期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左”的政治路线使新中国美育的正常发展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干扰和冲击。1957 年党的教育方针变成了“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美育被排斥在外。60 年代初，党中央为了纠正大跃进以来的“左”的错误，制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美育事业一度有所好转，但轻视美育的总倾向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变。至于 10 年浩劫时期，政治大动乱，经济大滑坡，文化大破坏，美育更是荡然无存，我国美育事业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毁灭性挫折。

打倒“四人帮”后，中国人民终于冲出黑暗，迎来以现代化建设为标志的新时期。改革开放推动新时期文艺迅速走向繁荣，美育也经过一个阶段的复苏而再度发展起来。20 世纪 80 年代初，“五讲四美”活动的开展，音乐课、美术课在中学课程重新确立，广大美学家、文艺家、教育家对美育的

大力呼吁，全国美育学会的建立，美育书刊的大量印行，这一切都成为美育事业迅速发展的重要表征。1986年4月，全国人大通过了《义务教育法》，明文规定了“在中小学教育中贯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方针，国家教委也随之成立了艺术教育委员会，专门负责教育系统的美育工作。这些法规和机构的设制，为美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上和组织上的保证。当然，80年代的美育发展也不是尽如人意，理论上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澄清，实践上也有许多环节需要疏通，但总的的趋势是蓬勃向上的，令人鼓舞的。

总结历史经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美育发展一是要靠时代发展需要所提供的机遇，二是要靠美育工作者的积极努力，三是要靠全社会特别是政府的大力支持。最后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美育事业独立性的确立。美育不是其他任何事业的工具和附属物，在整个教育事业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立地位。它既是目的、又是手段。不这样看，美育就会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就不可能发展起来，就不能充分发挥它在整个社会发展中的特殊作用。这一点已被美育发展的全部历史反复证明，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二、当今走向

众所周知，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社会再次发生了历史性转折，主要体现为现代化进程加速推进，经济体制急剧转型，商品大潮迅猛涌起，市场竞争机制由企业向文化教育部门逐步渗入。90年代中国经济开始了举世瞩目的高速发展，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出现了第一批冒尖的富有群体。文化方面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在新旧交错、多元分化的格局中，以大众传媒为主导的大众文化勃然兴起，全面突进，终至形成了与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三足鼎立的基本态势。正是在这样一个社会全面变革的时期，中国美育也呈现出一些全新的发展走向，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

第一，大众化走向。

中国古典美育以培养封建社会所需要的人才和人格为目的，它的实施对象主要是封建士大夫及其子弟。近代美育的宗旨是启发民智，改造国民性，其主要实施对象已转向了人民大众。蔡元培等人提倡的美育就是一种大众美育。新中国成立后的美育更是以服务大众、提高大众为目的，施教对象

更是面向广大人民群众。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大众美育，总体上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美育，是精英知识分子或社会有关机构向人民大众实施的一种意识形态性质的教育。而90年代以来的美育大众化走向，则是指一种自下而上的自我美育，反映了人民大众自发的审美需求。这是一种完全现代的大众美育，它的主要制导机制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带有商业性质的大众传媒。以报刊、广播、电视、电脑网络为代表的现代传媒，利用它的高科技手段，快速地、大批量地生产美育产品，而大众则自觉自愿地购买这种产品进行美育消费。由于市场竞争的作用，大众传媒不得不频繁地变换美育产品的规格样式，以刺激和迎合大众美育消费的多方面需求。大众传媒的这种商业性质就决定了当今大众美育的娱乐性和流行性的特点。当今的大众美育以娱乐性为首要指标，凡是能给大众带来娱乐的产品，大众就接受，就有市场，反之大众则置之不理，没有市场。在这里，美育的作用首先体现为娱乐性，其次才是教育，教育只能是娱乐中的教育。以往的大众美育也讲娱乐性，即所谓“喜闻乐见”，但娱乐性只能作为一种辅助手段而存在，摆在第一位的则必须是政治的意识形态教育。只有90年代以来的大众美育才真正把娱乐性推为首要原则，因为大众在工作之余花费时间和金钱，要换取的首先就是娱乐和休息。流行性是大众趋同的体现，但这种大众趋同又往往受到大众传媒的诱导和操纵，因而是不断翻新的、易变的，并带有一定程度的盲目性。以上所说的娱乐性、流行性本是当今大众美育的必然趋向，就它们本身来说是合理的，不值得大惊小怪，但如果这种趋向不加节制而走向极端（商业利益的驱动容易把这种趋向推到极端），则可能出现以新为美、以怪为美甚至以丑为美的偏差，这是当今大众美育中存在的最严重的问题，也是一个最让人感到棘手的问题。

——第二，生活化走向。

因为受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再加上过于急切的政治化和伦理化的目的，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中国美育是以文艺为主要施教材料和手段的。但是美育并不限于艺术教育，它的领域和范围应该是无限宽广的，包括与人们日常生活有关的方方面面，美育的发展进步也体现在美育领域的不断拓宽上。90年代以来的美育虽然也以艺术教育为重心，但同时又超出了艺术的范围，向人们生活的诸多方面不断渗透和拓展。如今，人们的衣食住行各个

方面，不仅讲究实用，讲究档次，而且还讲究美观。甚至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人们选择某一日常用品，首先注重的是它的造型样式，至于它的实用性和耐用性反倒成为无关紧要的了。这种对生活质量的审美方面的看重，是人们物质生活普遍提升到一定水平之后的一种必然追求，而这种追求的必然后果就是所谓美育的生活化走向。这一走向的具体表征体现为饮食文化的提出，交际舞、卡拉OK、美容、健身、各种休闲娱乐活动的普及，以及居室装修、家庭旅游、流行服装的时兴，如此等等。应该看到，美育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甚至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标志着中国美育的重大进展。但美育的生活化走向仍有个正确引导的问题，因为在生活高消费的刺激下，人们往往将生活的奢侈化误认为生活的美化，而且生活的美化本身也有趣味高低之分。就目前实际情况看，这方面的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

第三，社会化走向。

全面的审美教育应该包括家庭美育、学校美育、社会美育三个方面。其中，家庭美育与人的关系最密切，学校是美育的最重要的基地，社会是美育的最大课堂。这三个方面交叉重叠、相互配合、密不可分。但从近代美育的发展看，首先倡导的是学校美育，然后才可能涉及家庭美育和社会美育。蔡元培是主张家庭美育、学校美育、社会美育并重的，但他的主要业绩还是体现在学校美育上。因为家庭美育和社会美育更加依赖于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而这种高度发展在旧中国是很难达到的。新中国成立初期，美育发展的重点也是在学校美育上。只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民经济高速增长，个人收入持续增加，家庭美育和社会美育建设才有了真正坚实的物质基础，才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就家庭美育来说，从给胎儿实行音乐胎教，到送幼儿上各种文艺训练班，到给孩子购买各种美育器材和书籍，已经成为父母们竞相攀比的一种时尚。社会美育的主要内容，一是建立各种公共美育场所、设施、机构，二是美化居民生活环境，这些都需要国家投入大量资金。近年来，社会美育建设的进展尤其显著，许多中小城市也新建起博物馆、美术馆、植物园，一些多年荒废的名胜古迹、旅游景点又被重新修整、开发利用。此外，环境绿化、园林保护、中心广场的辟建已成为城市建设的不可缺少的重要项目。这一切都表明，社会美育的建设确实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并出现了大发展的势头，说90年代的美育有一个社会化走向并不为过。

当然，社会美育的建设涉及全社会的方方面面，是一个综合性的大工程，它的进一步发展尚有待于动员和协调社会各界的力量，筹集更多的资金，在这里，政府有关部门起着集中领导和统一规划的核心作用。另外，社会美育的建设也有个审美趣味的问题、是否符合美的规律的问题，这些问题自当成为美学和美育研究的重要课题。

三、现行对策

如上所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美育发展的三个走向是在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具有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而且这三个走向所反映出的诸多变化都是中国几千年美育史上前所未有的、深层次上的一些变化。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这三个走向在其演化过程中，又各自显示出其内在的矛盾性，如大众化走向中的美育功能和商业利益的矛盾，生活化走向中的审美化与奢侈化的矛盾，社会化走向中的审美需求与经济条件的矛盾，等等。如何从理论和实践上合理地协调和处理这些矛盾，使世纪之交的中国美育沿着正常的轨道进一步发展，以更好地配合全面素质教育的重大使命和适应即将到来的知识经济时代的历史要求，就成为一个严峻的课题摆在我们的面前。为此，我提出以下几点对策。

第一，美育理论的当代性。

要推进当今中国美育的发展，美育理论的建设必须先行一步，而美育理论建设的最重要的指标就是当代性。所谓美育理论的当代性主要有两个含义，一个含义是指理论研究的方法以及理论本身要达到当代的先进水平，要居于当代的领先地位。而要达到这一点的关键就在于理论创新。如何进行理论创新？这涉及多方面的关系。首先，理论创新不能抛开中国古代近代美育思想的传统。应该承认，从孔夫子到蔡元培的美育思想都是过去时代的美育思想，总体上已经不能满足新时代的要求。但是，在这些过去时代的美育思想中尚包含着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内容和具有启发意义的思想资料，应该通过对过去时代的美育思想的发掘整理把所有这些有价值的东西剥离和抽取出，并给予当代水平的新阐释。正是在这种新阐释里才能产生所谓的理论创新。以往的经验证明，“彻底反传统”或“与传统彻底决裂”是不可能有真

正理论创新的，也不可能有真正的理论当代性。其次，理论创新必须以全面开放的姿态学习借鉴西方当代美育研究及相关学科取得的新成果。从世界范围看，我们不能不承认，西方的美育研究一直处于领先地位。“美育”这一概念就是由席勒最先提出的。席勒的美育思想不过是他的哲学、美学思想的进一步推演，不免带有理想的、空幻的色彩。西方20世纪美育研究的一个重大进展，就是突破了以席勒为代表的古典美育理论的思辨性，而将这种研究置于众多相关学科的相互参照和相互论证之中。这样，美育研究的学科基础就不只是哲学、美学，还包括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传播学、符号学、脑科学等众多学科。当代西方美育理论的优势和领先地位就体现在它的这种多学科性、实证性和可操作性上。当今中国美育理论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尽可能地吸取西方美育研究的这些新进展、新成果，力争在同等学术水平上与西方理论展开对话交流，否则，理论创新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当然，“吸取”并不是简单的“全盘接受”，要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要有民族特色，更为重要的是，要以实践的检验为理论取舍的标准，这又构成了美育理论当代性的另一方面含义，就是理论研究要与实践紧密结合，要研究和解决当代美育中出现的现实问题。事实上，美育理论的领先水平并不体现为形式上的新概念、新术语，而是最终落实在能否把一般原理的研究成果运用到当今的美育实践中去，说明和解决当今美育实践中出现的新动向、新特点、新问题。所以，美育理论的当代性除了要求创新性之外，还应该具备前沿性和前瞻性，而后两者正是理论研究在密切关注和追踪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形成的品格。

第二，美育方式的通俗性。

提出这一点是针对当今美育的大众化走向而言的。当今的美育是一种大众美育，这种大众美育体现为大众个人的主动选择，而不是社会的硬性灌输，因而，在这种大众美育里，大众不仅是受体，也是实际上的主体。大众角色的这种双重性就决定了实施美育的方式只能是通俗性的，不通俗就会受到大众的冷落。美育方式的通俗性，首先要求美育产品的规格、样式、形式、内容能满足大众的接受期待和符合大众的接受水平。然而，现代社会中的大众又是一个由多层次、多成分构成的混合群体，他们的欣赏口味和欣赏水平也是多种多样、参差不齐的，为大众而制作的美育产品也应该是丰富多

彩的，应该有高、中、低不同档次的差别。此外，就某一层次的大众来说，他们的审美需求也在不断发展变化，与之相适应，美育产品也要有普及型和提高型之分。要求通俗性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大众，提高大众的趣味和水平。如果只是一味地迎合大众、投其所好，通俗也就变成了媚俗和庸俗了。美育方式的通俗性还有一层意思是指，美育的实施需要积极地介入和利用大众传媒。这不仅因为现今的大众美育以大众传媒为主要运行机制，还因为大众传媒本身既具有商业经营的性质，又负载着审美教育的功能。大众传媒的这种两面性本质上是矛盾的，当大众传媒过分考虑它的商业利益，为争取尽可能多的受众而有意降低美育产品的水准和质量时，它的审美教育的功能就会受到严重的侵害，甚至使美育异变为“丑育”。近年来灰色的、黑色的、黄色的货色通过各种传播媒介泛滥成灾、屡禁不止，已经证实了这种以美育为名而行“丑育”之实的有害倾向的存在。大众传媒是高科技的产物，本应成为也能成为造福于大众的最有力的传播工具，关键在于什么人出于什么目的以什么方式使用它。一切美育工作者都应意识到大众传媒的这种两面性和内在矛盾，积极地介入和利用大众传媒这个高科技手段，自觉地创作出既能吸引大众、又能提升大众的审美趣味和精神境界的美育产品，力争使大众传媒的经济效益和美育功能都能得到较充分的发挥。

第三，美育任务的时代针对性。

无论是生活的美化，还是环境的美化，最终都要落实到人的美化上。塑造完美的、理想的人格应是美育永恒的主题和使命。但是具体到某一时代，美育又有其具体的任务。那么，在当今时代，美育应承担的具体任务是什么呢？笔者认为以下几个方面最为重要。

首先，与素质教育的要求相适应，现时代的美育要以造就有创新精神的、全面发展的人格为中心，重点放在想象力和情感控制力的训练和培养上。想象力和情感控制力的高度发展是活跃的创新能力和协调的人际关系的重要前提，但在工业经济时代旧教育模式的影响下，这个前提不仅没有建立起来，反而受到削弱。当今美育应该在激发想象力、提高“情商”水平、培养人的“仁爱之心”方面发挥其独特的作用。

其次，当今中国正值社会急剧转型期，竞争压力逐步强化，贫富差距明显拉开，生活节奏日益加快，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体的人生际遇也变得越来

越难以把握。在这样的时代，人们的心理承受力受到前所未有的考验，极易造成各种各样的心理失衡和心理疾患。因此，通过艺术欣赏特有的心理宣泄、疏导、调和作用，以养成人们对生活的审美态度，加强人们的心理承受力和健全的心理品质，就成为当今美育的一项重要任务。

第三，环境污染是现代社会中最严重、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这个问题的主观根源就是现代人的急功近利的心态和对大自然掠夺式征服的态度。从这方面看，美育可以通过其审美的作用，唤醒人们心中欣赏自然、亲近自然、热爱自然的情怀，以对自然的审美态度补充对自然的纯粹功利态度，从根本上改变人与自然的不正常关系。

第四，社会转型期所产生的负面现象，诸如价值失范、道德滑坡、犯罪率上升、贪赃枉法等等，使得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的任务尤为迫切。当今的美育工作者应主动地配合这一任务，生产更多更好的相关内容的艺术作品，为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和法制观念、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作出应有的贡献。

(原载于《山东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20世纪初叶美育新潮的兴起及其当代意义

谭好哲

尽管早从先秦时代起，中国的传统教育即已包含了“诗教”与“乐教”的成分，但将美育或曰审美教育提升至完整的教育理念中，作为与德育、智育、体育并列的有机组成部分，却是20世纪初叶才发生的事情。1903年8月，王国维在清廷实施“新政”、全国兴办新式学堂之风日盛的背景下，于《教育世界》56号上发表了《论教育之宗旨》一文，将美育列为“完全之教育”之一部，其后又发表《孔子之美育主义》《去毒篇》《人间嗜好之研究》《霍恩氏之美育说》等文若干，倡导美育。民国二年（1913），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在其奠定了民国教育理论基础的《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中，把美育同军国民主义教育、实利主义教育、道德主义教育、世界观教育并列，作为“今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者”之一，并界定美育为“美感之教育”，此后又力倡“以美育代宗教”说，主张“美育救国”。1913年，时任教育部主管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工作的鲁迅，不仅写下了《拟播布美术意见书》，就美术之目的与效用、播布美术之方等问题发表了意见，提出了建议，以呼应蔡元培的美育主张，并且为纠正当时某些人对美育的错误理解，翻译了日本心理学家上野阳一的两篇论文《艺术玩赏之教育》和《社会教育与趣味》，发表在教育部的《编纂处月刊》上。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鲁迅更明确地提出以文艺改造国民性、疗救国民病根的主张。梁启超在维新变法时期即鼓吹“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希冀以此“改良群治”，达到“新民”之目的。20年代初期，梁氏更是写下了一系列文章，大力倡行“情感教育”或曰“趣味教育”，并视艺术为情感教育的利器，希图借艺术教育辟出一条改造国民的大路，使之皆成为“美化”的国民。以上诸公皆一代文化伟人，